



外国哲学

1

商务印书馆

外国哲学

第一辑

《外国哲学》编委会编

商务印书馆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永江 田士章 朱德生 汪子嵩
李毓璋 张义德 张世英 张显扬
陈宇清 陈启伟 武维琴 高 崧
蒋永福

外 国 哲 学

第 一 辑

《外国哲学》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2017·260

1981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72 千

印数 7,800 册

印张 11 插页 1

定价: 1.40 元

目 录 MULU

发刊辞

1

吸取人类思想文化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兼谈研究外国哲学的态度和方法

冯 定 3

关于哲学史的分段原则和阶级分析方法

朱德生 10

论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

陈 康 24

古希腊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汪子嵩 48

关于亚里士多德运动观的几个问题

杨寿堪 72

波依提乌斯的哲学

车铭洲 92

试论霍布斯的政治学说

赵 前 100

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

空想社会主义

王永江 121

略论黑格尔与资产阶级革命	杨一之 148
黑格尔《逻辑学》“有论”中的“有”与“无”	王树人 164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对立面	熊 伟 186
印度奥罗宾多·高士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黄心川 202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陈启伟 225
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思想	葛 力 257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与逻辑实证主义	洪汉鼎 284
战后法国哲学简述	杜小真 319
苏联对系统理论的研究	王炳文 贾泽林 331
圣西门论哲学家(补白)	163

发 刊 辞

外国哲学研究工作者一向苦于园地太少，我们希望本丛刊多少能弥补一些这方面的不足。本丛刊将以全部篇幅供外国哲学研究工作者发表研究成果，自由地进行讨论和争论，而决不人为地设定任何条条框框。我们只希望在这个丛刊上发表的文章，都是确有一番研究的、言之有物的创作。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希望本刊的作者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问题，但对作者的观点决不强求一律。凡是尊重科学、以诚实的态度研究问题的作者和他们写出的文章，我们都表示欢迎。事实上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他们写出的文章，也不能保证其中的观点都一丝不讹地符合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认为本刊应切实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便我们的学术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能够自由地、切实地发表意见，养成一种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矫揉造作，不拐弯抹角，而能直抒己见的学风和文风。

外国哲学，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在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外国哲学。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外国哲学，是指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外国哲学和当代外国哲学。以往的哲学要研究，当代的哲学也要研究。自己的专业和兴趣是古的或今的，就研究古的或今的，对于个人来说，只搞古的，不搞今的；或是只

搞今的，不搞古的，都不存在什么方向、路线问题。只要我们的研究真能做到有源有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都应该受到称赞。本丛刊在组稿的态度上，没有畸轻畸重。古今、东西，无分轩轻。

以往的哲学，是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哲学，可以说绝大部分也都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些哲学，无疑需要批判，但是，批判必须是充分说理的。单纯的政治讨伐，在哲学战线上是完全不足取的。只有在翔实地占有材料和认真地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批判，才是强有力的，才能把值得吸取的东西，吸取过来；把必须批驳的东西，批驳下去。

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研究以往的哲学，是锻炼和提高我们思维能力的有效方法；研究当代哲学，同样是锻炼和提高我们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研究哲学，当然要从基本阵线上去判断。但是，仅仅宣布某个哲学是唯心的或形而上学的，并不就等于克服了这个哲学。要克服它们，就要对它们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作出科学的说明，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就需要我们勤于和善于思考。摆在我们面前的外国当代哲学，五光十色，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武器，认真地来解剖、消化、吸收和剔除。

真理是过程，认识是长河。我们在起步和前进中，很可能会犯错误。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我们也希望不是白白地走冤枉路，而能够成为后来走上正确的先导。希望外国哲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给以支持和帮助！

冯 定

吸取人类思想文化中的 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兼谈研究外国哲学的态度和方法

《外国哲学》的出版，表明了理论界的同志和朋友们重视对于外国哲学思想的研究，重视国际之间学术见解的交流，是一件好事情。

这个刊物的出版，对于向外国学习，对于打开眼界，开扩思路，促进翻译工作，活跃学术空气，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人是有思想的高级动物，特别是能够进行象哲学这样抽象思维的高级动物。而思想总是通过交流，才能不断丰富与发展。凡是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民族，都是同他们善于从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那里吸取养料以滋补自己的肌体分不开的。而且学习得越是自觉，越是得体，越是充分，收效就越大。巍峨的高山，不辞寸土，浩瀚的大海，不拒细流。只有善于向外国的好东西学习，并把学习与独创相结合，才能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繁荣发达。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人类社会已有很长的历史了。老子当年说过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种“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早已成为人们的笑谈。自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以后，世界上的情况得到进一步的沟通。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思想文化技术的交流便越是广泛，越是频繁，越是丰富。现代的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更促进了这种交流。人们清楚地看到，近几十年来，任何一个民族在某个领域所做出的贡献（除开人为的限制），很快就变成人类共同的财富。

哲学这个东西，如同马克思说过的，无论在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时期，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哲学家以及他们的哲学思想，象灿烂的群星布满了人类思想界的太空，不停地闪耀着智慧之光。又象是用珍珠连接起来的彩带，架起了一道精神彩虹，使人振奋，使人探索。缺少思想交流、尤其是缺少哲学思想交流的民族，是不会有强大生命力的。

可惜的是，在林彪、“四人帮”对全国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日子里，这种交流被加上了种种条条框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被弃置不顾，不少思想的珍品被当成了朽木。

思想无国界，科学无禁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都出自其他民族，但是他们所提供的强大精神武器为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所掌握，变成自己翻身求解放的武器。黑格尔、费尔巴哈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但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至于其他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英国的赫胥黎，美国的华盛顿，法国的卢梭和孟德斯鸠，不仅影响了孙中山，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了毛泽东。当然，反过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对其他国家或其他民族也发生过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由此可见，思想理论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对各个民族的发展来说是何等重要！

在学习和研究外国哲学的问题上，除了要有足够的重视以外，还有一个态度问题和方法问题，也趁这个机会提出来和同志们交换意见，以推动理论空气的活跃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态度问题，就是要客观和求实，抱着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来研究问题。是与非、扬与抑，都要不存偏见，实事求是。

从道理上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不足，或者说，都有自己的独到的优点，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这句话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尤其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往往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在这方面，苏联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对待德国古典哲学态度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当时出版的哲学著作中，例如在1932年间西洛可夫和爱森堡合著（李达翻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里，就曾肯定了黑格尔对哲学发展的历史功绩和对资产阶级革命所抱的积极态度。在书中，一方面批评了过高地评价黑格尔的现象，另一方面，又充分而实事求是地肯定了黑格尔的功绩。书中说：“黑格尔的哲学因其辩证的方法而闻名于世界，这辩证的方法，借赫尔岑的话来说，是使黑格尔的哲学变为‘革命的代数学’，变为影响于辩证唯物论的创造者马克思的源泉之一。”在谈到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时，也首先指出，他对法国大革命是欢迎的，他的态度是积极和热情的。书中说：“黑格尔，在他制作辩证的方法之青年时代，同情于法国革命，他把拿破仑军队之侵入耶拿，当作新形态的绝对精神在历史中的体现去欢迎。当时他称拿破仑为‘骑白马的绝对精神’。”当然，书中也评述过黑格尔对待法国革命的矛盾态度，以及他从前期到后期的思想演变。在同一时期出版的其他哲学著作中，也都表达了与这本书相近的意思。这些书里的说法，大体上符合于黑格尔本人的实际状况，与恩格斯、列宁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评价比较一致。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性胜利，苏联的国际地位愈益提高，在苏联的领导者中滋长起看不起其他民族的倾向，夸大自己民族的某些长处，贬抑其他民族在文化方面的贡献。许多有杰出贡献的哲学家、军事学家以及其他思想界的代表人物，被轻易地判定为某个阶级的代表，或轻易地扣上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帽子。于是，对外国哲学的研究就不那么客观和公

正了。比如在评价黑格尔的社会政治观点时，说他是“贵族对法国革命的反动”。另一个德意志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即“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这个命题的首次提出者克劳塞维茨，在《简明哲学词典》的有关战争的条目里竟可以只字不提。甚至在一些书中（如苏联大百科全书“战争”条）说他的军事理论为后来的德国法西斯分子希特勒向外扩张提供了直接论据。这些说法显然是违反了实际情况。不能否定德国的军事学，克劳塞维茨的书还是值得读的。

中国在经济、文化方面虽然落后，搞四个现代化也还在起步，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的成就愈益显著，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有鉴于苏联理论界这个历史教训，也有鉴于林彪、“四人帮”搞过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历史教训，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是没有益处的。

这个教训就是：对待任何历史遗产或文化遗产，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去对待。不为偏见所蒙蔽，不为地位和权势所左右，不滥用政治原则，不以先入为主。这是我们对一切哲学的研究、包括对外国哲学的研究应采取的态度。

除此之外，也还有方法问题，就是注意把辩证法应用于研究工作。

一个是要注意政治立场与学术观点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另一个是注意把哲学当作认识史来研究。

关于政治立场与学术观点之间的界限，虽然有人说很难划清，这多半是由于我们多年以来搞政治运动，严重混淆了两者界限所造成的恶果。但是这个界限还是要划的。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反动和他在学术观点上是唯心主义，有时并无必然联系。反过来，一个人有进步的政治立场和他在学术观点上是唯物主义，也没有一定的联系。如前所说，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康德和黑格尔，在构造与发展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方面达到了高峰，可以说是集以往哲

学观点之大成。可是这两个人在政治上都同情过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尽管程度不同)。恩格斯曾说:“……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6页)就是说,一个最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在那个历史条件下,竟能成为当时是进步的德国资产阶级要求取得政权的象征。这看来是件奇事,其实并不奇怪。在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有过这种情况。谭嗣同的仁学,强调用精神力量(即他所说的“心力”)来革新弊政,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可是这并不排除谭嗣同是一个敢于英勇献身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这种矛盾着的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呢?因为哲学作为人类思维的最一般形式,其抽象程度远为其他科学所不及。把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说得那么直接、那么紧密、那么一致,是不科学的,是容易造成哲学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的。

其次,学术观点本身和某种学术观点曾经为某一政治服务,这也是两件事,不能因为某个哲学家或某种哲学观点曾为某一阶级、某种政治利用过,就武断地说,他便是这一阶级的思想家。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克劳塞维茨,马克思、恩格斯都称赞过他“书写得很好”。他的三部《战争论》,确实是不可多得优秀军事辩证法著作。他为了完成这部著作,曾经花了二十五年的时间,研究和比较过一百三十多个战例,并且抱着“不惜时间、不怕困苦、不畏权贵、克服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卑心”这样可贵的探索真理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最后得出了“战争是政治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样一个辩证法的天才论断。他的信条是:讲真理,只讲真理,完全讲真理。尽管以后德国法西斯曾利用了他的某些论点,但怎么可以由于这个原因,就把如此忠实于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的人,一下子就打成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军事理论家呢?

在我国解放以来,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对理论研究的破坏,造成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因人废言”、“因事废言”。只要有谁的某个观点曾被某人称赞过,或被某人批评过,那么就立刻把这个观点同这个人,甚至和这个人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联系起来,或进而同这个人的政治立场以及他所代表的“阶级”联系起来,这就不得了了。有可能从此把这个人捧到九天之上,或打入十八层地狱。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涉及这一类问题就噤若寒蝉、谈虎色变的道理所在。这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影响至今,现在应当彻底破除。

在研究外国哲学时,常常遇到许多是唯心主义者的著作,就发生了如何评价唯心主义的问题。许多同志都发表了自己有价值的观点,这里想从方法论角度,再说几句。

唯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是,正是为了反对唯心主义,有必要去研究唯心主义;不研究唯心主义,也就不能有效地克服唯心主义。从另外一方面说,不研究唯心主义,也就不能吸取唯心主义者所提供的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也不能很好地发展唯物主义。列宁说得很对,全部哲学史是人类的一部认识史,在对待唯心主义思想的研究中,尤其要注意哲学史作为认识史这一面。列宁还以黑格尔为例,指出黑格尔虽然是一个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者,但是在他的逻辑学中,“唯物主义最多,唯心主义最少”。列宁这种说法是很辩证的。它深刻地说明一种思想体系和这个思想体系所包括的内容不完全是同一回事。在唯心的形式下可以有唯物的内容,认识的真理的颗粒并不是天然地都属于唯物主义者。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如列宁所说,如果被人为地夸张,都可以变成一条独立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会把人引到为反动阶级服务的道路上去。因此,如果认为唯心主义全部是胡说,对人们的认识没有任何价值,那显

然就意味着，人的认识只能是从正确到正确，犯错误变成了不可思议的东西，那么哲学史的研究也就变成多余的了。事实上，研究唯心主义者为什么会陷入唯心主义？他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它是夸大了认识中的哪一个片断？它在什么问题给人以启示？在什么程度和什么范围内补充了唯物主义的不足？所有这些，正是研究唯心主义的真正价值之所在。有人把克服唯心主义看得很简单，好象凡唯心主义都臭骂一通，就算了事。其实，真正制服唯心主义，必须吸取唯心主义体系中所包含的那些合理因素。黑格尔说过一句很精采的话。他说，在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系统，必然是先前一切哲学系统发展的结果。（《逻辑学》中译本第353页）他还说：“真正的驳斥必须收揽对立的力量，并置身于他的力量范围之内。”他举例说，如果判一个案子是在被告缺席的时候进行的，那么，事情就决不会有进展。（同上，第338页）黑格尔这一论断，对于说明唯心唯物两者间的区别与联系，是多么深刻而又多么富有哲理啊！

从认识史的角度研究问题，就不会有对历史上所有哲学家作要么唯物、要么唯心那样简单的划分，也就不会在分析唯心唯物两条认识路线斗争时，象切西瓜那样一劈两半；而是能够在承认两条阵线相互斗争的前提下，对具体人物和具体的观点，依据情况作具体分析。

恩格斯说过，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可以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经济的发展落后于英国，但法国唯物论超过了英国唯物论。十九世纪的德国，在经济上也比英法落后，但它的哲学，就其内容的丰富来说，又超过了英国和法国。哲学的繁荣固然根源于经济的繁荣，但同时，它又可以促进经济繁荣。有人说我们现在是“繁荣的经济，贫困的哲学”，这是批评我们对发展经济重视，而对研究哲学不够重视，也反映了我们目前哲学研究的落后状况。我相信，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定将把哲学研究带动起来，使我们的哲学能较快地达到先进水平！

朱 德 生

关于哲学史的分段原则和 阶级分析方法

现在的哲学史著作，一般都是按社会形态来划分哲学思想发展的段落的。例如，奴隶制社会的哲学，封建制社会的哲学，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等等。虽然各本哲学史的具体表达略有不同，但基本原则是相同的。这样来归纳哲学发展的历史，科学不科学呢？到底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呢？我以为这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人们之所以要这样来归纳哲学发展的历史，大概是以只有这样来归纳才符合阶级分析的方法，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但是，我认为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恰恰是对阶级分析方法的一种误解。因为，在哲学史的研究中贯彻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要求我们用社会发展的规律或阶级斗争的规律来代替思想发展的规律。哲学发展史应该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的规律，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否则它就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了。如果按社会形态来分段落，恰恰就是在实际上否定了哲学思想发展所特有的规律和内在逻辑。如此就会象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哲学由科学变成了某种政治权威的侍女。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是要求我们在研究哲学发展史时不要把思想的过程看成是完全独立的。因为，哲学并不是在独立的思想王国中发展的，现实的阶级利害对它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不等于说，只要对某个哲学家或哲学思想作一个政治结论，就算是充分揭示了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了。也就是说，不能以所谓的阶级分析来替代哲学思想

本身的分析。因为阶级斗争不能直接创造出某种新思想来，它只是从这个或那个侧面决定着现有的哲学思想材料的进一步加工和利用；而且，这种作用也还要通过某些中间环节才能发挥出来。恩格斯在谈到哲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时说：“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所以，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的表现形式，并不是象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因为他想当领袖，他就能凭空创造出一种天才论、唯心主义先验论来。最多也只能利用历史上已有的关于天才论、先验论的思想材料，略加改造，以适应新的需要。否则，它就不叫哲学理论，只能叫宗教神秘主义了。

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离经济基础比较远的。它的发展过程的总趋势，固然是与社会发展史相一致的，但决不是亦步亦趋的。恩格斯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45页）所以，在思想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和经济利害都没有关系。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以先行的思想材料作为出发点的，而这种世代相传的材料，在人们的头脑中反复被加工，不断补充进新的结论。这样就形成了哲学发展和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一种理论的形式和内容似乎都是从纯粹思维中——不是从哲学家和思想家们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们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哲学史和其它思想史似乎

就成了由思想到思想的完全独立的历史。

这当然是假象，我们必须透过假象揭示其本质。但是，为了要揭示本质，我们又必须尊重这种假象。如果以为这是假象，就可以抛弃，那么，要求把握本质的目的也就会落空。因为假象并不是乌有，本质就表现在这种假象之中。所以，要尊重假象，也就是要尊重事实。但是，怎么才能做到既尊重假象又不被假象所迷惑呢？这就是要从假象入手，而不停留在假象上，即既要把哲学思想当做独立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又要揭示这种独立的相对性。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必然就会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概念与公式出发，不注意去揭示哲学思想发展中特有的规律性和内在逻辑。譬如说，现在编写的一些哲学史，很不注意、很不重视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命题的历史演变，只强调这种或那种哲学思想是如何反映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同时又不注意这种反映的复杂性（包括了逻辑上和历史上的）。结果就把古代的哲学和近代的哲学等量齐观了，无非是古代贫乏一些，近代丰富一些而已。例如，一谈起认识论，古代是不懂得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近代也是不懂得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却没有人追问这些概念是什么时代提出的呢？是如何提出的？提出以后，在不同的时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性的演变呢？又如，真理标准问题，古代是不懂得实践标准，近代也是不懂得实践标准的，却没有人提出，人类是怎样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前人的思想准备，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突然解决这个问题吗？……总之，一根金棍横扫到底，那还有什么历史呢？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在讲哲学史，但是它仅仅是按时代把哲学家和哲学思想排了一下队而已。夸张一点地说，哲学史已经名存实亡了。

因此，关键是在于正确认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不认识这一点，就不可能找到思想发展所特有的客观规律。那么，到底怎么来认识这种相对独立性呢？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可以从恩格